

◇ 逝者追忆

怀念孙叙伦先生

朱东旭

5月24日上午,文友黄飞松来电:孙老师走了。我蹲在地上,捂脸痛哭。

与孙老师结缘,始于文学。1991年春,我下派西阳乡,写了部中篇小说,寄给《清明》杂志社孙叙伦老师。两月后,他来信约我去合肥谈稿。编辑部里,孙老师正与人交谈,见我进来,起身握手,笑道:“小朱,先坐。”谈完稿,他带我去家中吃饭。师母不在,他买来熟菜,开了一瓶酒:“哥俩喝几杯。”我推辞,他硬劝,一杯便醉倒。迷糊中,感觉他为我盖上毛毯,笑着说:“想不到东旭没有酒量,遗憾。”

当年第5期,我的小说发表了,被他改名《左撇子》,责任编辑写着孙叙伦。从自由来稿中发掘一个山区无名作者,也算是破例。此后往来渐多,1994年他又刊发我的《走出乡村》。同年他调任《艺术界》主编,我有新作不便再寄他,但联系未断。

2003年,我的长篇小说《徽商妇》出版。借公差去合肥看他,送书请他指教。他随手翻阅,赞道:“语言进步很大,有先锋小说的灵动。”他带我参观藏书,满墙满屋,一本压一本,令人震撼。他将我的书放入书架,又抽出一本先锋小说集,说:“你的《徽商妇》还有先锋之韵。”

2005年,我调任县委党史办,研究新四军史,与孙老师联系渐少。而他凭着在文学、书画界的学养和人格魅力,把《艺术界》办成了全国文化界的品牌刊物。

2011年我加入中国作协,他打电话祝贺:“人要有目标,沿着它走,得失不必计较。”临

别时,得知我儿子教美术,他赠我几本《艺术界》,说可感受中西绘画的差异。我提到吴冠中,他点头认同。下楼时,他签名送我他的著作《走出斜阳》,谦逊地说:“多为工作所为。”我反复研读,从中学会了写评论。

2013年,我将“徽州女人”系列中短篇集结为《私奔》,去合肥请他作序。那天他做东,请来六七个书画界朋友,席间向众人介绍我,音色沉厚,慢声细语。他与人斗酒,率性豪放。有人向我敬酒,他竟代我饮了足足二两。临走,师母送我两瓶酒,我推辞,他说:“带着吧,不然梁姐生气。”此后每年春茶上市,我都寄茶给他们,十几年成了习惯。

很快,他写好序文《冰冷的牌坊,热血的青春》,推荐给出版社,后因经费问题未能成书,他没有责怪我。2015年序文在《新安晚报》发表,改了标题,也算圆了心愿。

我与孙老师相交二十余年,他长我四岁,从编读关系,到亦师亦友,再到兄弟情深。知遇之恩,没齿难忘。

2024年春,我的《包世臣先生传》完稿,请孙老师联系出版社。他说:“170年来,你是为包世臣作传的第一人,我支持你。出版后,我写篇评论。”两天后,师母来电:“你的孙老师在病床上联系好了安徽美术出版社,这是秦金根的电话。”当时我没在意,以为不过是小病,没想竟成永诀。

孙老师走了。老辈人说,地上走一人,天上添颗星。我仰望夜空,找不出哪颗是他——那便满天星辰都是他吧。让他看着我,在天地之间,与我们共生。

◇ 人物脸谱

望江有个“汪铁匠”

刘加莹

好友王根喜给我打来电话,说他老家来了一位朋友,邀我晚上一起吃饭。我和根喜相交多年,情同手足,欣然前往。

到达酒店,他的朋友已经等候多时,根喜介绍我们相互认识,还没等我听清姓甚名谁,对方就握着我的手说:“我是望江的‘汪铁匠’。”

饭桌上,“汪铁匠”听说我曾经在安庆工作过,抓住不放,把我作为重点“打击对象”,后来见我实在不胜酒力,也就不再纠缠。大家在敬酒的时候,有的叫他董事长,还有的称他书记,我感到非常好奇,就悄悄地问他:“为什么自称‘汪铁匠’?真打过铁?”“打了19年铁。”他很认真地回答我。“汪铁匠”打牌的瘾挺大,饭后又要掳蛋,我与省演讲学会崔跃松会长搭挡,他和根喜配对,打了两局,结果我们都输了。

为了搞清楚“汪铁匠”的真实身份,第二天,我特地向根喜打听。他告诉我,“汪铁匠”名叫汪毅,但在他们老家,甚至在县城,很多人都以为他的名字就叫“汪铁匠”。根喜说,汪毅出身贫寒,兄弟姐妹六人中他是老大,读了两年书便被迫辍学,11岁就跟随父亲以打铁谋生,后来又修理过农机具,搞过建筑,开过澡堂,现在是望江县文凯中学的党支部书记、董事长。学校和他本人在省市和全国都获得过诸多荣誉,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一个名人。

前几天,“汪铁匠”邀请崔跃松去学校为学生作励志报告,希望根喜和我也能一同前往,去学校看看。我犹豫不决,后来还是答应去了。车子刚到学校门口,“汪铁匠”快步过来迎接,趁着大家寒暄之际,我打量了一下他,约莫六十来岁,个子不高,身体微胖,脸色红润,坠在两边的耳垂,要比常人大许多。一副醇厚、善良、真诚的面孔。

“汪铁匠”一边领着我们参观校园,一边滔滔不绝地作介绍。他走路快,语速快,声音大,方言也很重,有些话我只能明白个大概。校园很美,有孔子塑像,有智慧塔,有爱心亭,还有24孝石刻、缩小版的六尺巷、杜鹃花园地等等。特别是墙面上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,常让我驻足良久,如“进校莫忘父母恩,读书牢记报国情”“千教万教教讲真话,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“没有教不好的学生,只有不会教的老师”……学校里的红色教育馆、国家安全教育馆、法制教育馆和模拟法庭,也都让我们耳目一新。

在休息室,我问“汪铁匠”怎么想起来办学校?他说自己没有文化,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,也特别敬重有文化的人。他告诉我,20多年前,他开办一个澡堂,晚上经常有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躺在澡堂彻夜不归,有时还在澡堂门口打架闹事。为澡堂安全考虑,同时也想摸清这些孩子的底细,一天晚上,他和这些孩子一边泡澡,一边谈心,原来这些孩子多是因为成绩不好,没有考上高中,没学上,还有的是父母离异或外出打工,没人管。和孩子们接触久了,他们对他们也就有了感情。他问这些孩子想不想继续读书,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:“想。”他又问:“你们害怕不害怕我管你们?”孩子们怯生生地看着他,低下头没敢回答。就这样,他关掉了洗澡堂,下定决心要办一所学校,让这些孩子有书读,有人管。

2003年,“汪铁匠”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,买了一个破旧厂房,聘请了11名教职工,招了39名学生,文凯中学就这样开张了。他说,我这个没有文化、不懂教育的人办学校,真是难于上青天,但好在有教育部门的支持,有学生家长的信任,特别是2008年,市、县教育局给他颁发了办学许可证,让他增添了“登天”的胆量和劲头。

信手翻看桌子上的学生花名册,惊讶地发现,原来文凯中学与普通高中是不一样的,这里的学生不仅都是中考成绩的线下生,而且很多人的家境都非常不好,还有少数“问题孩子”。我这才明白县关工委谢主任说的话:“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。”身旁的“汪铁匠”说:“教育不是生产流水线。孩子是一坨土,我们就把他烧成砖;要是一块铁,我们就把他炼成钢;是一粒黄金,我们就让他闪闪发光。”截至今年,已经有近万名学子从文凯中学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。很多人都说,“汪铁匠”为了这所特殊学校,倾注了大量的精力、财力和心力。我信。



◇ 民间风情

城里的端午

孙春旺

2009年端午,是我在县城过的第一个节日。心里空落落的,总觉得县城没有节味。端午将近,街巷依旧安静,大人上班,孩子上学,日子照旧,波澜不惊。端午当天,也不过是个平常周末,没有乡村

的热闹,没有邻里的庆贺。那时我笃定,真正的端午只属于山野,属于故土。

乡下的端午,是烟火里的盛典。节前好些天,家家就开始忙活。割新麦,磨新粉,蒸麦粿,满村都是麦香。田埂河畔,随处是采粽叶的人影。糯米泡上,粽叶洗好,巧手一缠,棱角分明。蜜枣的甜、糯米的糯、粽叶的香,层层裹在一起。皮蛋也早早腌下,端阳时切开,晶莹透亮。一饭一蔬,都是节日的郑重。

如今乡间习俗没断,只是变了模样。手工碾麦少了,但燕麦粿、包粽子依旧。仪式简化了,烟火气还在,节味没散。

我曾以为城里的端午清冷,没有忙碌,没有香气,安静得像日历上的一个标注。住了些年,才慢慢看懂——端午没消失,只是



端午锦 张雨义 摄

换了一种活法。

端午未到,菜市场边上早有了绿意。城郊农户天不亮就出门,赶着晨露割下艾叶菖蒲,装满电动车,进城摆摊。枝叶上还带着露水,一束束青翠欲滴。行人停下脚步,挑一束带回家。没

有锣鼓喧天,这一抹草木清气,就是城里人过端午的仪式。

插艾悬蒲,千年习俗,不分城乡。艾草生于野,坚韧质朴;菖蒲长于溪,挺拔清雅。古人用它驱蚊辟秽,也借它祈福安康。年少时只当是长辈的念叨,长大后才懂,那不是迷信,是顺应天时,是和自然的约定。

年年端午,妻子总在前一天买回一束艾蒲,插在门侧。小区里家家如此。高楼之间,没有炊烟,没有围坐,但门楣上那一抹抹青绿,一家连着一家,便有了温度。

我终于明白,传统不分城乡。乡村的端午,热烈而直接;城市的端午,内敛却绵长。形式变了,心没变。岁月流转,烟火变迁,习俗从不会真正消散。它只是换了模样,扎根在日常里,一代代,安安静静地传下去。